



为日军侵华“鼓”与“呼”的《庸报》

时间：2005-10-31 12:27:35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杨东伶 阅读1152次

为日军侵华“鼓”与“呼”的《庸报》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过程中《庸报》的头版分析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杨东伶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4级研究生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卫津路241号

邮编：300074

内容提要：创刊于1926年的《庸报》，在当时的天津刊行的对开大报中仅次于《大公报》和《益世报》而位居第三。从1935年蒋光堂将《庸报》卖给了日本关东军特务土肥原贤二，到其被日本同盟社接管，成为日寇“北支派遣军”的机关报，最后改名为《天津华北新报》，《庸报》一直有着“反动”的传统。为了配合日寇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加强日伪政府的反动统治，《庸报》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它反人民、助侵略的反动面目暴露无疑，且有逐渐加强之势。本文以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庸报》的头版为文本，从其报道的形势和内容两方面进行分析，揭露《庸报》作为天津沦陷后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如何为日军侵华作宣传，为日伪政府反动统治服务，揭露其反人民、助侵略的实质。

关键词：《庸报》 治安强化运动 剿共 兴亚

创刊于1926年的《庸报》，在当时的天津刊行的对开大报中仅次于《大公报》和《益世报》而位居第三。1935年蒋光堂以5万元为代价，将《庸报》卖给了日本关东军特务土肥原贤二。天津沦陷后《庸报》被日本同盟社接管，成为日寇“北支派遣军”的机关报，沦为日寇侵略中国的喉舌。《庸报》从被日本特务收买到1944年4月改名为《天津华北新报》，其反人民、助侵略的反动本质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有逐渐加强之势，这种反动的面目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以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庸报》头版为文本，分析其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表现，从而揭露其反人民、助侵略的反动本质。

一、《庸报》反动传统和治安强化运动的缘起

《庸报》创刊于1926年5月26日，创办人董显光，在当时天津对开大报中的依次《大公报》、《益世报》而位居第三。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后未遭到国民政府的抵抗和国际制裁，更加的肆无忌惮积极策划侵占华北。为此日

- 晚清的官报
- 抗战中的上海新闻界
- 《良友画报》的启示
- 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
- 清朝末年云南的报纸
- 邓小平与《红星报》
- 《小说月报》终刊之谜
- 绍兴历史上的报纸与报人
- 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
- 风云际会——《大公报...

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天津日租界积极活动，收买大量的军阀、官僚、地痞、流氓的同时，还收买了一些报馆和新闻界的败类作为宣传工具。而此时《庸报》在与《大公报》、《益世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但在当时的知识界和经济界还是一个较有影响的报纸。土肥原贤二于是把目标锁定在了《庸报》上。1935年春，蒋光堂以5万元为代价将《庸报》卖给了土肥原贤二。1936年，《庸报》完全被日被特务机关所控制。在天津没有沦陷之前，《庸报》就是以汉奸报纸的面目存在，“实际上充当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宣传工具和统制新闻事业的代理人。”[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占华北的部署迅速完成。为配合即将进行的军事侵略日本军部决定由《庸报》承担宣传“圣战”的任务。为此特派日本新闻界外务情报组织“闻人会”的骨干分子大矢信彦接办《庸报》并命令他尽快将该报改造成“军的机关报”。[2] 1937年秋，大矢来天津就任《庸报》社长，立即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对《庸报》的改造。大矢任社长后就确定由“北支派遣军”报道部直接控制。虽然《庸报》表面上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但实际上应发应扣什么消息，全由《庸报》自己做主。《庸报》实际上是日寇“北支派遣军”的机关报。它的全部职责和功能就是为日寇侵略中国进行舆论宣传，做日寇侵华的“传声筒”，制造汉奸言论，成为日寇在意识形态领域侵华的武器。

伴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日本的侵略矛头由中国扩大到整个东南亚，战线越拉越长，需要一个稳定的华北作为它的后方。从战略上看，华北地处日本侵略势力比较稳固的东北和中国广大腹地之间，是军事的战略要地。日本企图通过开发华北的经济搞所谓的日本、满洲、华北经济一体化，配合军事侵略，加强对华北的占领使之成为侵占全中国的战略要地。[3] 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太平洋战争开始，战线越拉越长，华北战略兵站的地位也愈发的凸显。在这种背景下，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为目的，这被日本称为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总力战”。内容是，其一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实行物资配给，防止物资流入抗日根据地。其二是对中国人民控制，如实行保甲连坐制，其三是进行残酷的经济搜刮。为支持侵略战争提出“勤俭生产”的口号，对生产进行管制。[4]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华北地区如火如荼的展开，《庸报》积极配合日军的战争步伐在华北展开了反人民、助侵略的宣传战。

二、表面形式变革，反动面目可窥一斑。

在历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庸报》作为日寇“北支派遣军”的机关报，可谓尽职尽责，为了搞好治安化运动的宣传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从《庸报》在治安强化运动的报道方式、体裁的使用、报社组织活动等方面出现了创新和变革来看，这所有形式上的变革，最终目的还是为日寇侵华服务。我们通过观察其在治安强化运动的报道形式变革，也能窥其反动性的一斑。

1、时间上进行连续报道，造成治安强化运动官民一致起努力的热烈局面。

在每次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中，从开始、进行中、结束都进行全程的报道，及时地总结成绩，对所谓的不足进行检讨并考虑“对策”；还不时地设置专栏对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深入的剖析，阐述开展治安强化运动的意义的战果。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在每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都有体现。1941年3月30日到4月3日，《庸报》头版对治安强化运动实施情形连续报告。“华北各地情形热烈，强化治安第二日”[5]“各省市工作益趋紧张，治安运动第三日”[6]，“各地运动极澎湃，强化治安第四日实践工作”。[7]这种连续性宣传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另外还有一专栏的形式出现，长篇大论成果汇报、全民动员、缺点总结。在这里举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进入尾声《庸报》的专栏总结宣传。在1942年12月9日开始，《庸报》设立了一个“圣战华北治安雄姿”的专栏，从9日开始到30日（除21、23日没有，28日在第二版）在其头版对一年多来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战果”进行总结，内容涵盖治安强化运动的全部内容诸如经济建

设、剿灭匪共、保甲体制、交通事业等，范围包括华北的京津地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如河北篇三篇：“治安确保跃进，冀民众完成动员体制”（上）[8]；“兴建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更进一步”（中）[9]；“强化农村经济建设，新民会工作普遍发展”（下）。[10]天津篇三篇，山东篇，肃正篇三篇，建设篇四篇，北京篇一篇，河南片四篇，山西篇一篇。

这种连续性报道宣传是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使用最多的。在实行新闻管制的沦陷区，众多的抗日报纸被查禁，《庸报》这种大量的、内容单一的宣传及容易造成舆论一边倒的态势。在这种单一的信息传播中，《庸报》作为日寇反动宣传工具的职能也就实现了。

2、体裁上，多种形式并用

在对于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报道中，《庸报》采用多种形式有消息、评论、专栏文章、标语等。利用消息的新、短、快的特点及时对治安强化运动的近况给予及时地报道，利用评论专栏对开展治安强化运动的意义、必要性进行理论的阐述，利用专栏总结评述治安强化运动的成果，对接下来的工作进行部署。

在这里着重谈一下《庸报》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标语的使用。在强化治安运动中标语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从1941年3月22日《庸报》上出现第一条关于治安强化运动的标语开始，直到1942年12月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结束，标语不间断地出现在《庸报》的头版上。《庸报》利用标语简断明了的特点，刊登每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目标。并且通过改变标语的位置和排列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庸报》充分的利用中国方块字的特点，草书、楷书、隶书、行书都被搬上了它的头版，刊登治安强化运动的思想内容。中国文字的俊逸之美，却被《庸报》用来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间接的成为奴化中国人民的工具。

3、《庸报》社自己组织活动，强化治安运动宣传。

《庸报》对日伪统治的报道以及对共产党的在其统治区的活动的报道，如果说还是基于一种“事实”，那么《庸报》自发组织对治安强化运动的宣传活动，其真实面目可谓展露无遗。

在五次治安强化的运动中，《庸报》自发组织了三次活动。1942年4月3日，《庸报》社组织在华北地区散发传单，并对此进行全程报道。“本报定备专机，遍飞华北散播传单，唤起治安强化认识。”[11]“本报银翼翔破千里，华北遍布治安传单，特出宣传工作出伟效”。[12]并且派出特派员随行报道实况，在《庸报》的报道中将日军统治下的华北描绘成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什么“万顷烟波农村鸟瞰”，“犁锄挥动忙春耕”[13]等等出现在《庸报》的头版上。

在1941年7月14日和12月4日《庸报》举办了两次征文活动。7月14日“治强运动本报悬赏征文”，我们看一下它的启示：“治安运动在现伟大展开之今日，凡我文化界诸同胞，尤应为民前驱，以文字启发对本运动之信念，本报特悬赏征文期我各方读者踊跃投赐佳章，共襄伟业……论文：何以剿共，治安必先剿共。奖金一等一百元，二等五十元，三等十五元。纪实：共产党之毒害。奖金，一等一百元，二等五十元，三等十五元。”[14]我们再来看以12月4日《庸报》的新年征文。“庸报征文启事”，内容“甲，反共；乙，中日满亲善合作；丙，建设新东亚；丁，庆祝新年为材料背景”[15]从以上的两则征文启事，我们不难看出《庸报》反人民、助侵略的反动嘴脸。在七月份的征文中，《庸报》不仅自身成为日军侵华的舆论宣传工具，而且以金钱为诱饵“号召”文化界人士为日军侵略中国“鼓”与“呼”。在十二月的征文紧紧围绕日军在华北展开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发动的战争，《庸报》宣传的重点指向了剿灭共产党和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上。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庸报》通过改变形式和自发组织活动，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宣传，时刻准备为日侵华“鼓”与“呼”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三、实质内容如一，反人民、助侵略昭然。

《庸报》形式的变革，归根到底是要为其宣传的内容服务。纵观《庸报》在一年半的时间对于治安强化运动的报道宣传，从根本上内容没有发生改变，只是针对每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点有所不同，围绕治安强化运动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庸报》开展宣传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前线侵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人民，而《庸报》在沦陷区群众的思想领域展开舆论宣传战，总的目的就是，对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领域强化“反共”、“剿共”的意识，帮助日军实现战略物资的疯狂掠夺来实现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从而加速沦陷区的殖民化。

1、粉饰侵略罪恶，美化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被伪政府进行了一番美化，形成整套的汉奸理论。在华北发动治安强化运动被解释成了当前急务建国之要图，“对外必先谋求民族之解放与独立，故急当摆脱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之羁绊，对内必先谋全国人民生活之安定，故急当确立治安，根绝一切妨碍国家进步之障碍。”因此在华北开展治安强化运动是“华北人民最先得享治安幸福，先当东亚共荣圈成立伊始，又应强化治安……故强化治安的效果就我国而言，即为建国之基础；就东亚大事而论，即可为兴亚盛业之起点。”[16]

《庸报》就是要把这种美化的汉奸理论在华北大地传播开去，发挥其“传声筒”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庸报》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标语宣传。“治安确定方能建设乡土，想要家庭安宁首先确保治安”[17]，“实现王道乐土必先保持治安，欲使乡土安谧应该加强治安”，[18]“治安巩固老百姓始得太平”，[19]“保持治安即是奠定国家基础”[20]“保卫自身安宁要促进全面治安”[21]，“维护治安需有明确地认识，大国民联合负起促进治安责任”[22]。而且在28日的标语旁还辅以说明“我们要维护治安先需要认清妨碍治安的敌人，就是匪共，更要有明确的准备，来一个全体大联合去促进，便自然会成功的”。这是治安运动正式开始前的动员宣传，类似这样的汉奸理论在《庸报》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伴随日军战事的展开，内容上有所差别。又如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大肆搜刮中国的财富使是沦陷区人民忍受战争和殖民统治带来的痛苦，竭力鼓吹“王道乐土”，“各尽所能共勉励，完成中日极乐乡”[23]。宣传“大东亚圣战”诸如“要防共中日便要提携，要治安上下便要一致努力”[24]，“团结起来进行东亚解放战”。[25]诸如此种言论反复出现，像12月10日的这条标语一直延续到了20日。

2、对剿共战绩的宣传，树立典型，表彰剿共勇士。

关于剿共战绩的报道与伪政府要员的演讲词、广播稿的数量不相上下。《庸报》对此方面的报道用尽夸张词语，渲染华北治安军事如何的强大，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们来看一下《庸报》在此方面报道的文章标题：《治安军移防首建伟功》，[26]，《日军精锐一齐发动，包围猛击冀东残匪我方官民协力肃清》，[27]《冀东匪军鱼游釜底，逃脱无路将趋全灭》，[28]《华北遍燃治安圣火，除共匪建和平农村，各省县实践工作首伟效》，[29]。像这样的题目数不胜数，“伟绩”、“伟效”、“战果”频繁出现在剿共成绩的宣传上，战果显著共匪将全灭时常出现在报端。

《庸报》充分发挥作为“机关报”的职能，树立所谓的群体典型和个人典型。在1941年8月3日的头版头条《庸报》刊发了这样的一条新闻《保卫乡土剿共匪，威名震动全华北》，引题是“冀中北部杨家庄，少年结成自卫队”。树立了一个群体剿共的典型。在8月4日《庸报》又利用标语树立了一个为治安“英勇献身”的个人英雄形象，《治安战线新英雄：汤阴县长张允行率部挺身击众匪，壮烈战死流芳名》。就是这些屠杀抗日力量，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走狗汉奸，在《庸报》上却作为典型、英模大肆宣传。[30]

3、歪曲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污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借助所谓“被俘”的共产党员和民众的口，说明共产党统治下的黑暗，歪曲共产党的政策。制造共产党统治区黑暗，民众“投明”的热烈景象的报道。如“民众不堪匪伪蹂躏纷自皖北投豫东避难”[31]，“易县匪区民不堪扰咸归新政”[32]。

利用第三者视角，描述共产党统治的黑暗，增强可信性和说服力。“冀东共匪行为卑劣，强征壮丁招农民反感，被伏两匪军述扰民实况”[33]，“匪共残酷暴虐民众，匪区逃出者谈共内幕”[34]。另外《庸报》还通过自己刊发标语，歪曲共产党实行的政策，丑化八路军、共产党，把他们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大魔头”。“八路军要米要钱要你做工，不肯呢，说你汉奸要你的命”，[35]“游击队随地吃喝随地奸淫，拉夫放火活埋良民”[36]，“共产党是无聊的走狗，八路军是共产的爪牙”。这种无耻伎俩，更加暴露伪政权剿共失败气急败坏的嘴脸。[37]《庸报》还通过设置专栏曲解党的政策。如专栏文章《中共欺骗民众的实例》，“把握民众及乡村工作的谬误。”（上）[38]“毛贼的屠刀！！比赤党铁的纪律还厉害，这超过一切的组织、纪律和理论”（下）[39]。在这两篇文章中把共产党对日本军的宣传“日本军来了，你们的屋子全部被烧了，家财被抢夺了，妇女被暴辱”说成是“胡说八道”，说共产党打着“使民众安乐”的“招牌”，对“贫农除免租税”是“标榜”。

统治区内抗日烽火怎么扑也扑不灭，《庸报》把反动宣传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这些为中华民族抗日做出卓越贡献的共产党人进行人格上的攻击和诬蔑，无耻谰言。此种行为不啻于街头泼皮无赖。在这里选取一部分《庸报》诬蔑共产党领导人的标语。从毛泽东开始。诋毁毛泽东丑化其形象，并未直接说毛泽东而是说的蓝苹（即江青）。“遗弃丈夫唐纳，放弃情夫张泯，撂倒毛泽东于石榴裙下，这是蓝苹的桃色史”[40]，“共产党军副头目朱德也换过四回妻，所谓红军女司令康克清是他第四妻”[41]，“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相继失脚，均倒了，周极狡猾竟不倒，所以叫做不倒翁”[42]，“性情暴烈如老虎，放火烧戮又奸淫，无所不为是贺龙”[43]。这种方式也用来打击抗日力量，分裂华北民众与共产党关系。这种手段可谓卑鄙至极，无耻至极。

《庸报》从被收买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其反人民、助侵略的面目一直未曾改变，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这种反动性更加的被强化。就像日本军国主义一样，为日军侵华大声“鼓”与“呼”，甘当日军侵华“传声筒”的《庸报》最终命运也只能停刊大吉，留给后人“汉奸”报纸的印象。

注释：

[1]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6期，19页

[2]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8期，96页

[3] （《天津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365页

[4] 《天津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36页

[5] 《庸报》1941年4月1日第一版

[6] 《庸报》1941年4月2日第一版

[7] 《庸报》1941年4月3日第一版

[8] 《庸报》1942年12月9日第一版

[9] 《庸报》1942年12月10日第一版

[10] 《庸报》1942年12月11日第一版

[11] 《庸报》1941年4月3日第一版

[12] 《庸报》1941年4月4日第一版

[13] 《庸报》1941年4月4日第一版

[14] 《庸报》1941年7月14日第一版

[15] 《庸报》1941年12月4日第一版

[16] 天津特别市市长温世珍关于开展治安强化运动的广播讲话，1941年3月30日。《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54页

[17] 《庸报》1941年3月23日第一版

- [18] 《庸报》1941年3月24日第一版
- [19] 《庸报》1941年3月25日第一版
- [20] 《庸报》1941年3月26日第一版
- [21] 《庸报》1941年3月27日第一版
- [22] 《庸报》1941年3月28日第一版
- [23] 《庸报》1941年7月27日第一版
- [24] 《庸报》1941年10月27日第一版
- [25] 《庸报》1941年12月10日第一版
- [26] 《庸报》1941年5月8日第一版
- [27] 《庸报》1941年6月2日第一版
- [28] 《庸报》1941年6月5日第一版
- [29] 《庸报》1941年7月11日第一版
- [30] 《庸报》1941年8月4日第一版
- [31] 《庸报》1941年4月11日第一版
- [32] 《庸报》1941年4月13日第一版
- [33] 《庸报》1941年6月22日第一版
- [34] 《庸报》1941年7月14日第一版
- [35] 《庸报》1941年7月15日第一版
- [36] 《庸报》1941年7月26日第一版
- [37] 《庸报》1941年7月19日第一版
- [38] 《庸报》1941年7月20日第一版
- [39] 《庸报》1941年8月8日第一版
- [40] 《庸报》1941年8月10日第一版
- [41] 《庸报》1941年10月11日第一版
- [42] 《庸报》1941年10月12日第一版
- [43] 《庸报》1941年10月13日第一版

参考文献:

- 1、《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白池田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
- 2、《抗日研究史述评》，陈德洪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
- 3、《冀东伪政权》，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合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
- 4、《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江夏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
- 5、《抗日战争大事集》，郭加复主编，上海社联出版社，1985年
- 6、《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依田谏家著，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
- 7、《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石家庄党史研究会编，新华出版社，1996年
- 8、《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天津市档案馆 天津市公安档案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 9、《天津市河东区爱国主义乡土史料》，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部资料 1996年
- 10、《天津历史风云》，陈德仁边，天津市宁河印刷厂印刷，1997年
- 11、《天津简志》，天津地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2《天津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3、《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马艺主编，新华出版社，2005年
- 14、《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8、42、75、90、96辑

为日军侵华“鼓”与“呼”的《庸报》会员评论[共 0 篇]

我要评论

会员名

密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联系CDDC](#)◆[投稿邮箱](#)◆[会员注册](#)◆[版权声明](#)◆[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